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Thinker Library
曹卫东 编
哈 贝 马 斯 文 集 第 三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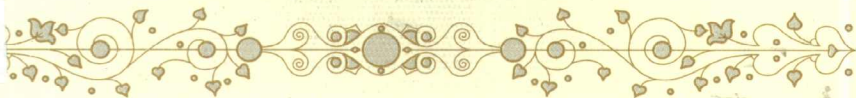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

后民族结构

曹卫东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Jürgen Habermas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

后民族结构

曹卫东 译

哈 贝 马 斯 文 集 第 三 卷
曹卫东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民族结构/(德)哈贝马斯(Habermas, J.)著;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哈贝马斯文集)

书名原文: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

原出版者:Suhrkamp, 1998

ISBN 7-208-04320-5

I. 后... II. ①哈...②曹... III. 政治哲学-文集
IV. 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3800号

Jürgen Habermas

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

politische Essays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8

本书中文版由 Suhrkamp 出版社授权出版

责任编辑 李 强

封面装帧 王晓阳

哈贝马斯文集 第三卷

后民族结构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6 字数 265,000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4320-5/B·342

定价 28.00元

编选说明

关于本书的内容,作者在前言里已有清楚的交代,这里无需赘述。需要解释的是,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集中反映了哈贝马斯对当前德国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的理解、批判和重构的思路,特别是他提出的所谓“没有世界政府的全球管理制度”,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以及其他现实政治领域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成为欧盟推行政治改革的理论资源。

此外,哈贝马斯在 2001 年 4 月访问中国时也摘取了本书的两章(“灾难与教训”和“论人权的合法性”),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进行了报告,试图让他的理论观点取得文化间性的效果。

为了便于大家了解本书的写作背景和现实影响,本卷增补了哈贝马斯的几篇文章。其中,“关于《事实与价值》”是一篇答辩文章,集中交代和解释了哈贝马斯的法哲学思路以及他对所遇到的批评的立场。另外两篇是“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和“知识与信仰”。我们知道,《包容他者》当中也有一篇“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两篇可以参照阅读。“知识与信仰”则是哈贝马斯荣膺“德国书业和平奖”的答谢稿,阐明了他对“9·11 事件”及其影响的看法。

前 言

对于新的跨界格局而言，“变动与界限”(Fluß und Grenze)是一幅很有诱惑力的图景。1846年，在法兰克福召开了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会议主要是为了明确民族的界限，可是到了今天，民族的界限却处于变动之中。本书前两篇主打文章就是要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阐明我们的民族语境。当时，共和主义的视角才刚刚萌发。今天，我们却在冷静地审视其灾难性的终结。^[1]

对短暂的20世纪进行回顾和诊断，目的是想澄清当下充满绝望的氛围。通过回顾，我们可以更好地关注下个世纪面临的棘手问题：社会福利国家的民主制度在跨越民族界限的情况下能否得到坚持和发展？“后民族结构与民主的未来”一文追溯了选择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治路线，但对超越新自由主义和老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套修辞不抱任何信任。^[2]

随着欧洲的货币政策开始一体化，我们注意到联盟有回转的趋势。满足于市场一体化的欧洲人与从民族国家的观念出发对欧元持怀疑态度的人携起手来，想一同使欧洲仅仅停留在经济一体化的水平上，并让欧洲在政治上永远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样做所要付出的代价预计就是社会发生扭曲，而这样的代价按照今天的文明标准来衡量是昂贵甚至过于昂贵了。没

有社会公正,也就不会有民主的合法性。这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人们对超越左和右的乌托邦设计应当保持怀疑的态度,但在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似乎存在着角色互换的可能性。因为,所谓“革命”,就是要打消人们对于平等的普遍主义标准的追求,把社会不平等归结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所具有的自然特性。

不过,在民族框架内,政治越来越难以与全球化的竞争保持同步。我认为,一种规范性的选择只能是使欧盟实现联邦制(欧盟本来就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上具有了一定的活动空间),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突破;然后,我们才可以去考虑在未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秩序,既保持着差异性,又实现了社会均衡。欧洲致力于消灭任何一种暴力,包括社会暴力和文化暴力,这样一个欧洲将不会受到后殖民主义的侵蚀,因而也不会倒退到欧洲中心主义。在人权的文化间性话语当中,也会保持一种充分解中心化的视角。

第三部分的文章概略地回顾了我在主要部分分析后民族结构的挑战所立足的哲学背景。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当中也包含着一个自主的概念。这个自主概念是反对重新讨论克隆人体器官的一个论据。

哈贝马斯

注释:

- [1] 本书没有收入拙文“向历史学习”(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载于布莱特豪尔(K. D. Bredthauer)和亨利希(A. Heinrich)编辑的同名文集, Bonn, 1997,第14—37页。这是一篇涉及到戈尔德哈根的争论文章,之所以

没有收入,倒不是因为我国固执己见。我丝毫不怀疑批判戈尔德哈根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准确理解。但我感到遗憾的是,文章标题所揭示的论题没有引起深入的争论,我所说的是历史在公共应用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分化。我们如果不区分清楚对于伤害人权和大众犯罪的道德立场、法学立场以及政治—伦理的自我理解(它们都是在民族框架内酝酿起来并展示出来的,也受到其他人的被动支持或宽容),那么,历史的公用就会堕落为煽动性的历史政治。从这个角度来看,戈尔德哈根的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哲学意义。他使用了一种解释框架,使得他能够把行为自由的道德维度用来对直接的凶手作历史分析。我们假定,一个行为者如果对行为的可能性有着一定的认识,因而能够承担起行为的责任,并且可以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作出规范的论证,那么,我们就说他享有所谓的“自由”。

- [2] 本文是和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文化论坛(1998年6月5日)上的对话稿。

目 录

编选说明	1
------------	---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民族语境

一、何谓民族?——三月前革命时期精神科学中的政治自我理解:以1846年日尔曼语言文学家法兰克福大会为例	3
二、论历史的公用	34

第二部分 后民族结构

三、灾难与教训——短暂的 20 世纪:回顾与诊断	49
四、后民族结构与民主的未来	70
五、论人权的合法性	133
六、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	151
七、信仰与知识	162

第三部分 现代性的自我理解

- 八、现代性的概念——两个传统的回顾 177
- 九、哲学与政治的不合拍——纪念马尔库塞诞辰
100周年 207

第四部分 反对克隆人的论据

- 十、遗传学的奴役统治:复制医学进步的道德界限 217
- 十一、不是自然阻止克隆,而是我们自己必须作出决定 221
- 十二、克隆人不是民事案件 225
- 附录一:关于《事实与价值》——对卡多佐法学院会议文集
的回应 229
- 附录二:哈贝马斯研究文献(1959—1981) 273

第一部分

民族语境

一、何谓民族？

——三月前革命时期精神科学中的
政治自我理解：以 1846 年日尔曼
语言文学家法兰克福大会为例^[1]

1. 双重目的

无论是在“法兰克福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邀请函当中，还是在《日尔曼语言文学家议案》(*Verhandlungen der Germanisten*)^[2]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举办者心存双重目的。在图宾根法学家莱舍尔(Reyscher)的发起下，一批著名学者，如格林兄弟(Jacob und Wilhelm Grimm)、格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兰克(Leopold Ranke)、乌兰德(Ludwig Uhland)、达尔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贝塞勒(Georg Beseler)、米特迈尔(Karl Mittermaier)等，共同创建了一个学会，致力于把德国法学、德国历史学以及德国语言学这三门学科打通研究。学会的首要目的在于为学术交流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因为，在此之前，学者除了阅读杂志和书籍之外，相互之间基本上都是一些私人关系。信件来往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不仅法学家、历史学家以及语言学家之间跨学科的交往是这样一个情况，各个学科内部，哪怕是日尔曼语言文学之间的交往也是这个样子。于是，就有必要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交往形

式,以便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和学习——“自由发言,自由讨论”,而且不允许“念稿子”。这种形式脱胎于1822年的全德自然学者和医生的学术大会以及1838年的古典语文学家大会。当然,发动者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全德人文学者大会将会被看作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

第二个目的超出了学科的要求,是一种政治目的,主要是为了结束祖国的四分五裂状态,实现祖国的统一:

如果要求我们直接干预生活,对于一次学者聚会来说未免期望过高;但是,这次会议无疑是立足于学术研究,尊重时代的价值性和严肃性,而且每一个人都充满了鼓舞全体民众的激情,因此,我们敢说,我们的会议所取得的成绩不容低估。〔3〕

会议的日程安排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后来者,我们在职业和生活当中自觉与精神科学以及我们国家的共和主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今天,我们再来阅读这次会议的有关记录,还会深切地感受到打动与会者的动力之所在。当然,回顾历史,我们从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那里也能发现一些非政治的因素。但无论如何批判,没有谁不会为这种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开端所吸引。学者们对其对象(即“日尔曼民族的古典文献”)的探讨,与当时的政治趋势是息息相关的。

不过,这次学术活动还是充满了悲剧性的反讽意味。因为,人们欢呼雀跃的开端,其实是一次终结:在政治意义上是这样,在学术史意义上也是这样。1846—1847年在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和吕贝克(Luebeck)召开的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是第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它试图把构成早期精神科学核心内容的各个学科综合起来。五年后，德国的法学家和语文学家各自建立起了自己的组织，而且合乎科学学科分化的规范模式。

从 18 世纪末开始，除了已经确立起来的古典语文学和古典艺术史之外，其他的精神科学学科也都建立起来了。但是，由于它们都主张一种历史主义观念，因此，它们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因而还不能形成一种完善的学术氛围。到了 19 世纪 40 年代，也就是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召开的时候，精神科学学科的形成阶段宣告结束了。参与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的只有四位被精神科学史家罗特哈克尔 (Erich Rothacker) 列为奠基者，即格林兄弟、兰克和维尔克 (Friedrich Gottlieb Welcker)。他们似乎是最后几位能够进入以下杰出学者行列的人物。这里所说的杰出学者主要包括：赫尔德 (Herder)、默泽尔 (Möser)、沃尔夫 (Wolf)、施莱格尔兄弟 (Friedrich und August Wilhelm Schlegel)、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洪堡 (Humboldt)、尼布尔 (Niebuhr)、撒维尼 (Savigny)、艾希霍恩 (Eichhorn)、克罗伊策 (Creuzer)、格雷斯 (Görres)、博普 (Bopp) 以及伯克 (Boeckh) 等。^[4]在开始的时候，各个学科还使用相同的语言，罗特哈克尔引用了两段著名的话来形容 1774 到 1854 这 80 年的发展过程：

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内在核心，就像任意一个球都有重心一样。(赫尔德语)

每一个时代都直接面对着上帝，时代价值的基础根本不是时代的产物，而是时代的实存。(兰克语)

法兰克福大会试图掀开科学历史的新篇章,其实际效果却是使开端走向了终结。从科学史来看,法兰克福大会也是对名称的转换。〔5〕此时,雅可布·格林从语言科学的角度提出了“日尔曼语言文学家”(Germanisten)这样一种荣耀的称号,而在当时,这一称号一般已不再用于法学家,而是专门针对现代语文学家。

同样被证明是幻觉的,还有日尔曼语言文学家的角色。他们以为他们在政治公共领域当中能够扮演民族精神的当然解释者。众所周知,两年之后,就在这次会议附近的保罗教堂(Paulskirche),人们试图把德国建构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主义宪政国家,但却未能取得成功。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的代表当中大约有10%参加了第一次德国国民大会,他们当中的多数还是核心成员。所以,威廉·舍雷尔(Wilhelm Scherer)才会把这次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称为“法兰克福会议的前奏”〔6〕。“三月前革命时期”(Vormärz)是第一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精神科学的领袖人物都志在发挥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公民所具有的职业知识的公用。当这样一种尝试摆在政治知识分子面前的时候,我的师辈,不管是在1933年之前、期间还是之后,显然都没有表现出他们作为公民的积极性。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的是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150年前,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在法兰克福的恺撒大厅(Kaisersaal)呼吁新闻自由,他们当时对此是有着清楚意识的。但我们不敢断定诸如佩特森(Julius Petersen)、博伊姆勒(Alfred Bäumler)、贝尔特拉姆(Ernst Bertram)、瑙曼(Hans Naumann)或罗特哈克尔(Erich Rothacker)这样的思想家也有同样的意识。

保罗教堂运动的失败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这一点我不

想详细讨论。但日尔曼语言文学家作为这次运动的一个组成力量，他们的失败则不仅仅是由于历史原因。构成障碍的还有作为早期精神科学的哲学当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的自我理解。他们的失败之处，不仅仅在于未能成功地逾越学科的界限。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还包括对于未来的潜在建构，这使得他们误以为自己的民族已经成熟。我想根据雅可布·格林的观点，简要地描述一下历史学派的哲学背景；然后，我想根据他们讨论当中出现的矛盾，阐明面向未来的民族精神观念是如何使自由主义的精神陷入困境的；格维努斯(Gervinus)回避了由于民族精神学说的历史动力所带来的内分(Eingrenzung)和外别(Ausgrenzung)的辩证法。当时，只有像弗勒贝尔(Julius Fröbel)这样的民主主义者才能透彻地揭示出文化意义上的“民族”(Volk)与公民组成的“民族”(Nation)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他们恰恰没有出席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日尔曼语言文学家所作的第一次杰出的努力，就是要介入共和主义的公共领域，后来他们再也没有作过这样的努力。最后，我想指出的是，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得出非政治的自我理解是有其学科自身内部的原因的。

2. 早期精神科学的世界观

雅可布·格林主持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主要讨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的关系。在雅可布·格林看来，化学和物理学是建立在计算基础上的精确科学的典范，它们把自然当作一架机器，并分解为不同的组成要素，用它们来实现新的技术目的。“非精确”科学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由于感官心灵结构异常精巧（“一种特别的个性装置”），它们深入到了多元的有机体和人的内在

历史结构当中。它们不是表现为“令人震惊和恐怖的杠杆和发明”，而是表现为内在价值，表现为对象的尊严：

语言、诗歌、法律和历史当中的人性内容，比动物、植物和化学元素离我们的心灵要近得多。

然后，格林出人意外地转向了军事，他补充说道：“用这些武器，一个民族可以战胜外来者。”^[7]

雅可布·格林作出这样的圆型表述，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从事观察和说明的自然科学所把握的是一般现象和合乎规律的关系，而理解型的精神科学探讨的则是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对象的个体性。雅可布·格林关注的不仅仅是一般与特殊、“计算科学”和“表意科学”之间的对立关系（这是文德尔班后来使用的概念），他还涉猎了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对立关系。解释学对于理解的前判断结构的认识主要在于，我们比他者能更好地理解自身。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一点首先表现在诗歌当中，“诗歌实际上只能用母语来理解”。日尔曼民族的古代文物也是这样。记载着民族精神的这些古典文献对于今天的人来讲充满了魔力，要想深入理解它们，我们就不能依靠任何中立的科学研究，而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理解者把他的主体性贯彻在认识过程当中，目的是要满怀热情地从他者身上重新发现自我。解释学的理解似乎离不开攫取和占有的激情：

只要有火，就能把锅煮沸；任何一种被冠以拉丁语名字的新植物，只要气候允许，我们就希望它在所有的地方都能茂盛地生长；但我们喜欢的却不是什么外来词，而是历史上